

#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及其原因

丁平一

基督教的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新教都曾先后传入过中国,来华传教士又以天主教和新教居多,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约,大量涌入中国,传教规模迅速扩大。基督教许多教派都派遣传教士到湘组织差会,许多差会在进行传教活动的同时创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和教会医院。传教士的这些活动给近代湖湘文化涂上了一层有别于古代文化的色彩,而传教士的到来引发的多起教案也成为社会各界十分注目的事件。

## 一、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到的抵制

基督教所受到的抵制主要是指近代以来连绵不断发生的教案。教案是指中国民众聚集起来,打砸、烧毁教堂,殴打、驱逐传教士的一种暴力事件。中国近代以来教案频繁发生,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所发生的教案总数多达1600余起<sup>①</sup>。从时间上看,教案多发生在辛亥革命以前,辛亥革命以后教案减少,除1922年全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外,大的教案发生很少。

湖南是一个教案多发地区。1860年代初才有传教士进入湖南,而一旦进入湖南,教案就接踵而起了。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如下数起:

### (一)衡州、湘潭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条约除割地赔款外,还有保护传教、保护传教士在各地租买地皮建堂造屋的内容。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大量涌入中国。1861年,西班牙传教士方来远来到湖南,他在1858年时曾来过湖南,被衡阳县城人民驱逐出湘省。这次他能再来湖南,是因

为有条约作护符。来衡州后,方来远占用民房并强买土地建教堂。同时还大量吸收教徒,教徒中有些人是当地的不良份子,他们入教目的是想依恃教会势力达到欺侮良民、横行乡里的目的。当地一个姓姜的教徒因作恶多端,被民众告到县衙被判入狱,有些民众借此号召群众起来反对教会,而方来远却到县衙为姜某说情,由此而激起民愤。衡州府民众纷纷结集起来,赶走了方来远,并与长沙人民联合刊布了控诉外国传教士、反传教的《湖南闾省公檄》。檄文指责传教士用宗教对中国人民进行侵略以及伤风败俗的罪行,并结合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全体人民共同抵抗外国侵略和抵制传教,并限令入教教徒立即退出教会,改过自新。宁乡士绅崔暕还以“天下第一伤心人”的笔名,刊印了他所写的《辟邪纪实》。该小册猛烈攻击英法侵略者的侵略行径,强烈指责传教士的言行,崔暕后来又将书中内容改编为通俗易懂的《辟邪歌》,起到了很广泛的宣传作用。方来远因不能回衡州,又悄悄到了湘潭,他要求县衙退回以前被封闭的教堂,并又在湘潭占民房作住房。衡州的反教波及到了湘潭,湘潭考生三千余人举行大规模集会,控诉天主教,并焚烧了天主教堂,方来远逃往汉口。衡州民众受湘潭的感染,连续烧毁了衡州城内和黄沙湾的教堂。这次教案不仅在全省反响很大,而且江西等地人民也纷纷响应。

教案发生后,方来远到北京,要求清政府重处此次事件。清政府答应赔修被烧教堂,并将湘潭、衡阳、清泉三县知县革职,而且还答应了方来远提出的七项要求。

### (二)周汉反教案

周汉反洋教是发生在1892年,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一桩反教案。发起人是湖南宁乡人周汉。

周汉(1842-1911),字铁真,晚号铁道人。他从小习读诗书,其父周瑞英1860年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去世,周汉承袭云骑尉世职封号,投身新疆左宗棠部湘军,参加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升到陕西候补道。因其弟病逝新疆,周汉乃绝意仕途,请长假回湘。回湘后客居长沙,致力于刊布善书的活动。周汉等人所刻之书,多以敦风励俗,劝化人心为主旨,靠募资捐赠等方式印刷,由各地善堂传发,这些刊刻活动为他后来大量印发反基督教宣传品提供了方便。八、九十年代,教会势力在湖南发展迅速,传教士声言要打开湖南这座“铁门之城”。在这段时间,传教士依恃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常出入府县衙署、包揽词讼、享受特权,令民众十分反感,再加之人教之徒中许多是当地人民痛恨的恶棍,他们也依仗教会势力鱼肉百姓,横行乡里,更激起民众对教会的痛恨。周汉对某些传教士和教徒的所作所为很愤恨,从1889年起,他开始撰写大量的反洋教宣传品。在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通过他所熟悉的刻字铺刊刻、印发反洋教的书本、图画、歌谣、揭帖等宣传品数十种,由各地的善堂和书商广为散发,流传很广。这些反教宣传品除3篇是以周汉个人名义所作外,其余均用化名。宣传品的题名有《天猪叫》(天主教谐音)、《鬼拜猪精图》、《打鬼烧书图》、《叫堂传叫图》、《猪叫取胎图》、《猪叫刺眼图》、《猪精恶极图》、《族规治规图》、《鬼叫该死》、《自励四绝》、《谨遵圣谕辟邪》等等。这些宣传品竭力丑化教会、传教士和教徒,揭露教会在中国的恶行,坚决捍卫中国的“正教”,既包含了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情绪,也含有盲目排外倾向。如在题为《鬼叫该死》的通俗小册子里,周汉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反教卫道和反侵略的思想:“自古我中国圣人尧帝、舜帝、禹王、汤王、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传下六经四书,教天下万世,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夫要义,妇要顺,兄要友,弟要恭,朋友要信。其余道理虽多,总之以这五伦为重。释、道二教虽比尧舜各位圣人的小有不同,大道理还是一样,总之不离这五伦”,因此,“世上只有这三教是正,再未有第四教了”。还说:“各国鬼王想谋中国江山,特制鸦片烟来剥中国银钱,害中国的性命。中国已经上当了,弄得地方也穷了,百姓也伤残了。但只一宗,中国的人个个恨鬼是无奈人何。鬼王又想出奸计,欠了一着提防,

及把鬼堂一起,鬼王分派一伙鬼叫头,名色不一,到处煽惑,又把些银钱灵活中国一伙亡八婊子光棍痞子猪一样的人,就进了那天猪鬼叫……无非是煽惑人里应外合,好谋中国的江山。”在《谨遵圣谕辟邪》一宣传品中,周汉为自己预做了一幅挽联:“以遵神训、讲圣谕、辟邪教而杀身,毅然见列祖列宗列圣列仙列佛之灵,稽首自称真铁汉;若忧横祸、惑浮言、惧狂吠而改节,死犹贻不忠不孝不智不仁不勇之臭,全躯岂算大清人?”<sup>②</sup>这些宣传品既有浓烈的反侵略爱国的精神,又有强烈的捍卫中国“圣道”的殉道精神,同时对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进行了猛烈批判和极端丑化,而且印刷的数量多,散发的范围广,再加上辗转流传,在全国许多省份都造成了影响,它不仅掀起了湖南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高亢情绪,而且也推动了全国反教斗争的发展。

周汉的反教宣传引起了各国教会和侵华者的不安。1891年夏,长江中下游地区教案频繁发生,各国驻华使节在其致总理衙门的照会中,多次指出反教宣传品对教会的损害,强烈要求严查惩处。清廷出于外交上的压力,于同年6月发布“上谕”,谕令倘有匿名揭贴造言惑众者,要立即严密查处,从重治罪。8月23日,英、美、德等九国公使又联合照会总理衙门,对6月发布的上谕执行不力表示不满,说:“种种匪犯,迄今概未拿获一人,惩办一人”,反而引起“谣言散布,既久且速,几遍中土。”<sup>③</sup>9月,英国传教士杨格菲在湖北黄陂县寻获到两本周汉写的《鬼叫该死》的小册子,又获得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函副本,内容是请求谭继洵释放在武汉散发反教宣传品而被捕下狱的他的亲戚汤弼臣,信中周汉承认各种宣传品是他与长沙宝善堂的同事及文武官绅所印发刊刻的,汤不过是恰逢赴鄂,顺便带发而已。并承认自己是刊布反教宣传品的带头人。杨格菲获到证据后,立即向美国驻汉口领事嘉托玛建议,关闭长沙宝善堂并立即罢黜周汉和宝善堂官绅之官职。嘉托玛还将所搜集的宣传品择要或全文译成英文,寄回英国外交部,以期获得政府的支持。11月中旬,嘉托玛约请各国驻汉口领事会议,商讨对策,结果通过了一份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抗议书,抗议湖南省当局不执行上谕,致使成千上万的反教宣传品在长沙公开刊刻印发,要求地方官立即制止这种敌视教会的运动,惩处反教的人。不久,周汉与长沙书商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等人被捕,但因周汉等

人多方活动,官府以其罪证不足将周汉等人释放。

周汉等出狱后,仍然继续印发传播反教宣传品,结果又被德国公使巴兰德获得9种,并将所获送往各国总理衙门,指出这些东西大都是长沙周汉等人刊发的,要求查禁。总理衙门即刻致电张之洞,要他马上查处周汉。不久,德国公使巴兰德又将寻获的28件反教宣传品送交总理衙门,英国外相接到使馆上报的材料后,也电令英国使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在英、德等国的压力下,总理衙门于1892年1月再次下令有关省份,严禁查处反教宣传品,追查制造者,并再三催令张之洞查处周汉等人。张之洞知道周汉在湘省素有威望,恐查捕他引起更大事端,于是颇费心机,想出一处理办法,向上禀报说周汉“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公文,造言煽惑,自未便漫无惩戒,致令滋生事端。相应请旨将在籍花翎陕西补用道周汉暂行革职,查传到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sup>④</sup>对于三家书铺,则勒令永远关闭,邓懋华、陈聚德各杖八十,枷号三月,所查获图书均由江汉关道孔庆辅当着各国驻汉口领事的面予以销毁。此次风波总算勉强平息。周汉虽受革职处分,但反教活动并未停止,只是较以前有所隐蔽。

1894年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周汉对此也痛心疾首,他的反教宣传再度活跃,广泛流行于湖南及周边各省。英国公使欧格讷又多次照会总理衙门,说周汉的书已经5省印刷,还有一种为7省通印,每册首页均刻有周汉之名与“仿湖南原刻”字样。于是,总理衙门又下令两湖、两广、云南、浙江、河南7省严加查处。1897年,德国借口山东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各国纷起效尤,乘机向中国攫取各种利益,周汉立即从宁乡赶往长沙,大量刊印《大清臣子周孔徒遗嘱》等揭帖,四处散发,其中有“悉将耶稣妖巢妖书器焚烧,毋为妇人之仁,以乱大谋。并宜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再燃,妖根再发。”<sup>⑤</sup>周汉的活动再度引起英国干涉。1898年初,英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拘捕查办周汉,此时朝廷也一再下谕要保护教堂教士,陈宝箴乃派员前往宁乡的拘传周汉。正在宁乡县城应考的生童闻讯哗聚公堂,以罢考要挟县令上书巡抚释放周汉,湘省搢绅也多方声援,陈宝箴深感此案颇为棘手,适值张之洞又电催重办周汉,陈乘机请求将周汉押解到湖北审理。张之洞也深感此案颇为棘手,即刻复电拒

绝押鄂。陈宝箴势成骑虎,只好就地审理此案。审理过程中,周汉拒不认罪,并要求平反旧案,周汉写了3篇供词,供词从狱中传出,群众将其刊印为《天柱地维》,并注明系“湖南七十六厅州县绅士庶民公刊”。官府担心事情越闹越大,最后只好以“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照疯病办罪,交监狱长期关押。至此,延续多年的周汉反洋教案才告结束。周汉反洋教案是全国教案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桩教案。

## 二、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制之原因

对于基督教为什么会在近代中国受强烈抵制的原因,学术界一般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教案是“中西文化冲突的产物”;另一种认为是“反侵略爱国主义运动的产物”。笔者认为这两种提法都欠精当。

### (一)教案是民族矛盾异常激化的产物

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反帝反侵略的历史,就是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和斗争的历史。因此,将教案置于近代中国民族矛盾异常激化使社会性质发生变化这一大背景中去考察可以出现两种现象:民族矛盾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反侵略爱国情绪;民族矛盾也激发了中国人盲目排外的情绪。而教案与这两种情绪都有关。

首先,教案中体现出来的反侵略意义,主要在两方面:

其一,反基督教与反不平等条约紧密相连。鸦片战争前,西方传教士一直是不能公开和随意到中国传教的,鸦片战争后因有不平等条约保护才能大批来华。因此,从传教与不平等条约共存这一角度考察,反传教就是反不平等条约,反不平等条约就是反侵略,反侵略自然是爱国行为了。

其二,教案中反传教士的某些不良活动也含有反侵略意义。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中确实有许多是抱着单纯的传教目的来华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中国开办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和从事翻译,他们对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但有些传教士来华后却有些非法活动。如强占中国人的土地和房屋建教堂、干预地方司法、干预和轻视传教地乡俗。如鸦片战争后,法国传教士首先提出要归还清康熙、雍正年间没收的基督教的教堂和房产。天主教

尤其被人痛恨,他们在“以教养教”的方针下,要求退还房产和侵占土地的行为最多。因为,新教在鸦片战争前基本没来中国,来传教的大都是天主教,故由天主教引发的教案特别多,周汉反洋教宣传品中攻击的也大多是天主教。有些教会为了广收教徒,一些在乡里不为人们所齿的地痞也被吸收入教,而这些人人教目的是想从教会得到好处。这些不法教民仗仗教会势力可以逃刑、免差役、欺侮百姓,很令当地群众反感。因此,反对教会的这些有损中国利益的行为确实含有反侵略的意义。

其次,反教的教案中也存在着盲目排外倾向。

盲目的民族自大心理,以及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封闭保守观念,造成对外来文化持有的怀疑和轻视态度。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国力衰弊,任何外来东西都更引起人们警惕和恐惧。在盲目自大、盲目排外的情绪支配下,反基督教的教案常采取一些非理性行为。如周汉的反教宣传中,就有许多夸张歪曲之词,说天主教是“天猪叫”,说传教士吸人血、剜人眼、食人心,育婴堂是为吃小儿肉而设的。而这些宣传有极大的煽动性和迷惑性,它利用民众的愚昧闭塞和对侵略者的仇恨,鼓动人们对教会采取极端暴力。因此,反教的形式往往是野蛮粗暴的。如殴打甚至打死传教士,砸毁和焚烧教堂等。反教宣传品中也是号召人们采取暴力行动,日本人佐贺原价所著《拳乱纪闻》中就记述反教宣传品中鼓动民众“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这样一来,使反教蒙上了一层野蛮落后的色彩,并不利于树立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而且,每次教案都是以中方失败告终,结果都是赔偿经济损失,向传教士赔礼道歉,革职或调离地方官。监禁或处死教案中的为首者,允许教会重建教堂。这种盲目排外引起的后果都是中方受损。这种盲目排外情绪也是在西方列强侵华而引起的异常激烈的民族矛盾下激化的。

(二) 教案是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华儒教文化冲突的产物

基督教是西方宗教文化的代表,儒教则是中国人信仰的依归。不同的文化因其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等不同原因而有自己的特质,不同特质使不同文化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发生冲突,近代中国教案的频繁发生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基督教与儒教文化的异质性造

成的。

首先,基督教与儒教文化在价值观上有冲突。其一,两教的“上帝”观不同。基督教是一神论的宗教,它认为统治宇宙万物的只有唯一的神——上帝。神是独一无二的,上帝是天地的主宰,万物的唯一造物主。《圣经》说:“我是耶和華,在我以外并没有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只有笃信上帝耶和華的信仰才是唯一真实的信仰。”这种唯我独尊、独一无二的上帝观是基督教一切价值观的基础。儒教信奉的上帝则是“天地君亲师”,其核心又是“君亲”。如任继愈所说:“君亲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核心。天是君权神授的神学依据,地是作为天的陪衬,师是代天地君亲主言的神职人员,拥有最高的解释权。”<sup>⑥</sup>儒教的上帝是以尊卑秩序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超乎一神与多神,介乎有神与无神之间的一种宗教信仰,特别是汉代确立了儒学独尊的地位,董仲舒阐述了“君权神授论”以来,儒学更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儒教宣称,君主的权力是天授予的,皇帝是奉天承运、代天立言、替天行道的“天子”。君主被神化,君权与神权紧密结合起来。由此可见基督教的“上帝”与儒教的“上帝”都是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各自都认为自己是天地的主宰,两者皆独尊,必然产生排他性,这就是信仰儒教的人对其它宗教自然产生了排他性。而在中国,几乎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饱读诗书的士绅都把儒教的“三纲五常”基本教义融入心灵深处,在自己心目中将其神圣化、绝对化、本体化。在湖南发生的教案中,大部分是以读书士子为主要反教力量,周汉反教案也是由儒教的忠实卫护者受儒教教育长成的士绅为主体力量。其二,两教崇拜的对象不同。基督教崇拜的是由圣父、圣子、圣灵组成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是“圣父”,是“天地全能的创造者”,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圣子”,圣子是因圣母玛利亚感受“圣灵”而受孕成为肉身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本体的神。儒教崇拜的对象是“天”、“祖先”、“孔子”。“天”是授予皇权者,故皇帝“祭天”以尽孝道。“祭祖”是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逢祭日,全家男女老少都要参加祭祖仪式,而基督教却不允许入教的人祭祖,这犯了中国的大忌。在祭天、祭祖时,人们自然也同时要祭创立了儒教理论的孔圣人。两教崇拜对象的不同也是构成其互相排斥的重要原因。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前,早就有基督教传入中国,那时中国还没有受(下转第137页)

3700余辞条,许多是首次面世,因而其编辑和出版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多少年来,有关湘西的话题不少,许多学者也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相关成果,但是,全面系统、具有基础建设性的大规模总结性著作尚未出现,这与湘西丰富的文化成果,厚重的精神积淀很不相称。湘西文化是地处湘西的各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来的一朵奇葩,她属楚巫文化的重要一脉,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今天,湘西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大家庭中一颗极有个性特征的细胞。作为一个具有

独特性质的文化人类学标本,湘西具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进化秘笈,所以,研究湘西文化或许能为化解当今文化发展的痼疾提供一剂良药。

当然,这部内容全面、资料翔实、具有一定开创性的工具书不能说是完美无缺,因为她是第一次,也就必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是,就辞典本身的出版是值得肯定的,而编撰者们敢于“啃硬骨头”的勇气则更应嘉许。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所博士生)

(上接第129页)到西方侵略,也没有激烈的民族矛盾和对外战争,但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在中国仍然难以立足,入教者寥寥,而传教士却是使用了浑身解数也未能使中国有丝毫“基督教化”的迹象。从许多文献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基督教与儒教的文化冲突是历来都明显存在的,而鸦片战争后则更激化了这种冲突。

其次,基督教传华在近代更明显构成了对儒教的威胁。传教士深知,不在理论上批倒儒教,就不可能达到他们“中华归主”的目的。因此,传教士多次指责儒家文化。如说:“儒家未能实现它自己的国家、家庭、社会的理想。我们必须进一步说明儒教的许多弊端是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是教育系统的结果而不只是属于人性的恶,而且儒家文化一直没能根除这种恶。”<sup>①</sup>他们还宣称,传教士到中国是到了“西方文化最大的异教堡垒进行攻击的最前线”,唯有基督教“能够开创新中国的纪元,唯有它才能提供道德动力,增强人们抵制鸦片、酒、社会不道德行为、贪财、享乐、权势等罪恶的决心,并给人以纯正的品格。”<sup>②</sup>他们还设计了如何以基督教取代儒教的蓝图:“如果我们要取代儒家思

想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从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那里夺取他们现在所占有的地位,我们必须培养受过基督教和科学教育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sup>③</sup>很明显,传教士否定了儒教的基本价值,带着强烈的征服欲试图摧毁和取代中国传统儒家文化。

(作者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注释:

①②⑤转引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第1、188-189、194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③《教务教案档》,第5辑(一),第75、93页。

④《教务教案档》第5辑(三),第1343页。

⑥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⑦⑧谢卫楼:《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第26、32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⑨秋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同上,第15页。

# 基督教在近代湖南受抵及其原因

作者: [丁平一](#)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刊名: [船山学刊](#)  
英文刊名: [CHUANSHAN JOURNAL](#)  
年, 卷(期): 2001, ""(4)  
被引用次数: 0次

## 参考文献(6条)

1. [戚其章, 王如绘](#) [晚清教案纪事](#) 1990
2. [教务教案档](#)
3. [《教务教案档》第5辑\(三\)](#)
4. [任继愈](#) [论儒教的形成](#) 1980(01)
5. [谢卫楼](#). [见陈学恂](#) [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 1988
6. [狄考文](#) [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sxk200104031.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csxk200104031.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e4f93dc1-2c98-4a5a-895e-9e4d008e6375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